



JOINT REPORT SERIES

2026

全球治理倡议中的全球南方： 角色与议程



CGAIG
CENTER FOR GLOBAL AI INNOVATIVE GOVERNANCE

全球治理倡议中的全球南方： 角色与议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院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

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

复旦发展研究院

2026年4月

目 录

一、理解全球治理倡议的时空背景与演进逻辑.....	7
（一）秩序过渡期和全球治理的“危”与“机”	7
（二）从概念凝练到行动主导：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脉络	10
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全球南方”声音	14
（一）建设性参与和渐进式改造.....	14
（二）公平、发展与效率的三重优先.....	15
（三）结构性约束与行动困境.....	17
（四）推动改革完善的思路探索.....	18
三、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全球南方”力量.....	19
（一）从规范倡导到行动供给的重要贡献.....	19
（二）以“共生安全”为引导实现“发展型安全”	21
四、打造韧性包容供应链的“全球南方”优势.....	24
（一）基于全球投入产出网络的地位跃迁与功能重塑	24
（二）能力约束与外部冲击的双重压力.....	27
（三）从“被动嵌入”到“主动塑造”的优势拓展.....	30
五、迈向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的“全球南方”经验.....	32
（一）推动绿色发展的动能和贡献.....	32
（二）发展约束下的多重诉求.....	33
（三）不对称结构中的绿色转型困境.....	35
（四）绿色转型路径与合作议程重塑.....	36
六、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建章立制的“全球南方”实践.....	39
（一）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南方实践与制度外溢.....	39
（二）从原则共识走向制度落地的治理需求.....	41
（三）外部环境约束与自身能力瓶颈.....	42

(四) 推动治理建章立制的三条路径.....	43
七、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合作和共同现代化的关键力量.....	46
(一) 坚持南南合作，筑牢团结互信的合作根基.....	46
(二) 以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	47
(三) 坚守公平正义，引领全球南方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49

摘 要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秩序进入深度重组的过渡期。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加速抬头，地区冲突频发多发的负面影响加速外溢，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挑战交织叠加。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合法性、约束力与制度供给能力上的赤字，加剧全球治理体系的失衡与碎片化趋势。

202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已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支持。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不在于另起炉灶，而是呼吁通过渐进式改革完善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以主权平等与国际法治夯实治理的合法性基石，应对部分国家对规则的选择性适用与单边制裁泛化的冲击；强调多边主义和以人为本，优化治理路径与价值取向；推崇行动导向，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和普惠性。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是助力全球治理倡议由理念走向实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中坚力量。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建设性参与”和“渐进式改造”，推动既有多边机制的代表性与包容性提升；另一方面，强调对发展类议题的优先回应，实现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的平衡。然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内部差异性，导致全球南方国家面临集体行动、制度协调与议程整合等方面的约束，需要强化集体身份构建、推进机制创新，制定分阶段与差异化治理目标。

世界和平与稳定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先决条件。全球南方国家从规范倡导走向行动供给，逐步成长为国际安全治理的重要支点。面对“集团对抗”与“零和博弈”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倡导多边主义与战略自主，依托区域组织、多边平台与双边渠道参与冲突调解、政治对话与危机管控，并通过维和行动与安全合作机制提供公共产品，“共生安全”逐步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协作的重要导向。未来，需要推动形成“发展型安全”路径，

在保障主权与安全的同时拓展发展空间，为全球和区域安全治理提供有别于传统同盟体系的实践范式。

在维护和提升全球产供应链韧性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的角色正由“边缘节点”向“关键枢纽”转变。随着南北贸易依赖关系调整与生产网络重塑，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投入产出体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但是，各国仍面临产业能力不均衡、技术水平差异与外部冲击加剧等双重压力，制约南南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需要推动标准互认、加强区域与跨区域合作、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供网络，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低碳发展领域开展能力建设与经验共享，将此作为由“被动嵌入”迈向“主动塑造”，提升产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性的关键路径。

实现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是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先议题之一。针对全球气候治理遭遇“逆流”，各国推进可再生能源部署、政策机制创新与南南合作，对全球减排与可持续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然而，能源可及性、融资与技术支持不足、发展与减排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国际制度安排的不平衡，依然制约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与合作。需要将包容性转型路径、促进技术普惠与金融创新、强化南南合作机制，作为重塑全球绿色发展议程的重要方向。

人工智能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前沿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正由人工智能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向场景供给者、制度探索者与议题推动者，在防灾减灾、医疗卫生、农业治理等领域形成以发展导向为特征的实践样本，其核心诉求在于推动安全与发展并重，加强能力建设并提升规则塑造能力。但受制于技术封锁、规则外溢、算力不足、制度薄弱与人才短缺，相关国家在建章立制过程中面临多重约束。需要从构建发展导向的风险治理框架、完善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强化南南合作与规则协同三方面，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工智能治理能力建设。

中国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者，也必将是引领者和贡献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始终坚持“扎根南方、心系南方、服务南方”的战略定位，将自身发展同全球南方紧密联结。在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进全球治理倡

议落地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赋能全球南方的共同现代化，突破对西方模式和发展路径的依赖；通过注入创新发展动能，引领全球南方绿色转型与数字化红利共享，积极参与新兴领域规则塑造；通过坚守公平正义，引领全球南方国家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大金砖合作”等平台高质量发展，成为凝聚南方共识、缓解发展赤字、实现共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一、理解全球治理倡议的时空背景与演进逻辑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有增无减，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空前突出。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加强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机遇、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正确选择。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①。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聚焦“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个时代课题^②，为破解全球治理失衡、失灵与失序问题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中国方案。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还明确中国将“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③。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演变，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有望成为中国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最佳实践”。

（一）秩序过渡期和全球治理的“危”与“机”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演变。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全球治理赤字加重，有关国际秩序“破”“立”之争更为激烈，秩序过渡转型期的特征突出。

第一，“丛林法则”削弱国际规则的约束力。个别国家依赖单边行动、军事手段和选择性适用规则来实现战略目标，针对主权国家实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军事打击、跨境军事行动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140页。

^② 外交部：《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2025年9月1日，https://www.mfa.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gjs_673893/xwlb_673895/202509/t20250901_11699909.s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2026年3月1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至推动政权更迭，强化所谓“以实力塑造安全与和平”的错论论调，推动国际关系重新滑向权力政治逻辑和“丛林法则”。这一变化不仅削弱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的权威，也动摇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地区冲突动荡的负面外溢加速扩散。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地区冲突对全球安全和经贸体系产生跨域联动效应，加剧全球能源市场和供应链、关键海上通道、以及主要金融市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互疑不断加深，普遍强化军备投入与同盟依赖，军事对峙和安全防范水平提高，部分冲突呈现外部力量深度介入和代理人对抗的趋势，向更大范围外溢甚至升级的风险上升。以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和无人作战系统为代表的新兴军事技术正在改变传统威慑结构，局部摩擦更容易升级为更大范围的冲突。

第三，各国政策内顾化与叙事竞争叠加，加速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个别国家遵循从“本国优先”甚至“本国唯一”的政策理念，减少有关发展融资、减贫合作、绿色投资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相关国际倡议的支持。频繁的“毁约退群”“撤资断供”不仅削弱国际多边合作机制，还对右翼势力崛起、本国利益优先派掌权的国家造成“示范效应”，加剧全球治理的“失败主义”情绪。部分发达国家主张通过提高关税壁垒、限制技术转移以及推动产业本土化来维护国内经济安全，在强化贸易保护主义、产业回流和供应链重构的同时，逐渐将部分全球治理责任向新兴经济体“转嫁”，导致气候治理、发展融资和减贫合作等领域的资源供给明显不足。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5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仅有 35%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按计划推进或取得适度进展，近一半目标进展缓慢，18%的目标甚至出现倒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偿还成本创下 1.4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①。

第四，围绕发展模式与国际合作的叙事竞争加剧。一些国家通过“债务陷阱”“依附关系”等叙事将发展议题政治化，削弱多边合作的信任基础。个别国家还试图将全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① United Natio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5*,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5/>

新问题归因于多边机制本身，多项民调显示公众对联合国的信心下降^①。西方评论将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解释为“另起炉灶”或“制度分裂”，并将其与所谓“阵营对抗”相联系^②。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传统多边平台中，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共识缩小，“守成势力”与“崛起势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更加明显的对立风险。

随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缺口扩大，“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叙事逐步瓦解，全球南方国家对更加公平、包容的治理方案提出更高期待，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地提供重要机遇。

首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叙事陷入共识危机，增加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吸引力。长期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大力推崇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相关叙事建构在拜登政府时期达到顶峰，成为其强化美国盟伴体系，通过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对国际规则的选择性适用，遏制围堵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然而，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发起全球“对等关税”，发出控制巴拿马、吞并加拿大、夺取格陵兰等惊人言论，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榨取盟友利益，严重冲击其盟伴体系的内部认同。202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加拿大总理马可·卡尼（Mark Carney）在演讲中指出，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死，世界正处于多极化的动荡转折点^③。

同时，部分欧洲国家针对“唐罗主义”实践的纵容态度，以及政策选择上的“双重标准”，进一步削弱该叙事的道义基础，为中国从议题设置与机制创设层面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新空间。在理念层面，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广泛参与、协商一致与成果共享，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加包容的治理框架。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数字和绿色转型等领域，中国借助比较优势参与

^① Vision of Humanity, *Is Public Trust in the UN Falling?*, 20 August 2025, <https://www.visionofhumanity.org/is-public-trust-in-the-un-falling-a-look-at-global-survey-data/>

^②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hat Is the BRICS Group and Why Is It Expanding?*”, Backgrounder, 2023,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what-brics-group-and-why-it-expanding>

^③ “Carney says old world order 'is not coming back'”, BBC, 21 January 2026,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ly3d28p4p8o>

制度创新，推动全球治理“新疆域”的制度规范与合作框架转型。

其次，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结构性缺口，为基于全球治理倡议的建章立制提供机会窗口。美国曾是全球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制度供给者之一，其财政支持、规则制定能力以及制度领导力构成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但是，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在国际和多边机制中再次开启“退群潮”，先后退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多边机构和国际协定，拒绝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还在 2026 财年预算提案中提出大幅削减对联合国体系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财政支持。2026 年 1 月 7 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以“有悖于美国利益”为由指示美国退出 31 个联合国实体和 35 个非联合国组织^①。国际社会对于美国之外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制度塑造方和合作倡议方的期待随之提高。

最后，“唐罗主义”实践的冒险性和破坏性，增加全球南方对于非西方治理模式的需求。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的“特朗普的门罗主义推论”（又称“唐罗主义”）实践加速，其所体现的强势干预逻辑和破坏性后果，增加国际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测性，也激发全球南方国家对于非西方治理模式的期待。2025 年 12 月 9 日，以全球南方国家为代表的 43 国宣布成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打造汇集集体智慧、动员共同努力的包容性平台^②。

（二）从概念凝练到行动主导：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脉络

1. 主权平等与国际法治：夯实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石

虽然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主权国家间国际体系的确立，但各国在法律层面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平等。国家间在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制度资源方面的差异，使主权平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ithdraw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7,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6/01/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withdraws-the-united-states-fro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that-are-contrary-to-the-interests-of-the-united-states/>

^② “关于成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组”的共同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025 年 12 月 9 日，https://un.china-mission.gov.cn/czthd/202512/t20251210_11769933.htm

等原则在实践中面临结构性约束，这种不平衡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尤为明显。例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 60%^①，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发达国家仍掌握超过一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②。因此，推进全球治理倡议需要把主权平等原则作为前提，不仅确保各国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也包括在制度参与权、规则制定权与议程设置权方面更加公平的制度安排。

此外，国际法作为协调国家行为的制度规范，为全球治理提供根本保障。个别国家选择性适用规则和单边制裁，通过长臂管辖对他国企业实施制裁，扩大国内法律的域外适用范围，不仅构成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破坏，也削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权威与稳定性。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需要全面、完整、善意地遵守国际法与国际规则，大国则需要带头反对双重标准与国际规则的差别化适用，做国际法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

2. 多边主义与以人为本：优化基本路径与价值取向

全球治理倡议以多边主义为基本路径，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立足于现有多边制度安排，倡导通过改良完善的方式缓解治理代表性和有效性问题。其中，“共商”强调广泛参与的议程协商，“共建”强调责任共担与能力建设，“共享”强调治理成果的公平分配。坚持多边主义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稳定预期、增强透明度，而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例如，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下形成的国家自主贡献机制，使各国在减排目标上形成制度化合作。截至 2024 年，《巴黎协定》的 195 个缔约方已经提交 168 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③。围绕维护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支持联合国落实《未来契约》等方面深化合作，是推进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目标。

^①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24,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

^② Kevin P. Gallagher & Richard Kozul-Wright, “No Voice for the Vulnerabl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eed for Quota Reform at the IMF,”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2022. https://www.bu.edu/gdp/2022/10/11/no-voice-for-the-vulnerable-climate-change-and-the-need-for-quota-reform-at-the-imf/?utm_source=chatgpt.com

^③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24 NDC Synthesis Report*,

全球治理倡议将人民福祉置于中心，将人的发展权视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价值取向。当前，全球发展的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约有 7.3 亿人处于长期营养不良状态^①。中国长期致力于为发展议程驱动的南南合作贡献力量。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宣布 5 年内提供“6 个 100”项目支持，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提供来华培训和奖学金名额，免除有关国家无息贷款债务，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和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并把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应对全球人道主义挑战作为合作优先^②。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需要把各国人民视为全球治理的根本参与者和受益者，为全球发展提供公共产品。

3. 行动导向：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与普惠性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其行动力既包括发达国家切实履行责任，提供更多资源和公共产品，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联合自强，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例如，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拥有 100 多个成员国，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地区，累计批准项目融资规模超过 500 亿美元^③，相关项目集中于交通、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气候治理领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融资支持。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成员已扩大至包括阿联酋、孟加拉国、埃及等在内的多国，累计批准项目超过 100 个，总融资规模约 350 亿美元^④，重点支持可再生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水资源管理和数字化建设等领域，为新兴经济体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nationally-determined-contributions-ndcs/ndc-synthesis-report/2024-ndc-synthesis-report>

^① FAO,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4*,

<https://openknowledge.fao.org/items/ebe19244-9611-443c-a2a6-25ceec697b361>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 年 1 月，

<http://www.scio.gov.cn/gxzt/dtzt/2021/xsddzgjjfzhzbp/>

^③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Reports USD8.4 Billion in 2024 Project Financing, Underscoring Long-Term Impact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onds*, June 2025,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25/aiib-reports-usd84-billion-2024-project-financing-underscoring-long-term-impact-through-sustainable-development-bonds.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④ New Development Bank, *Annual Report 2024: Investing in a Sustainable Future, 2024*,

https://www.ndb.int/wp-content/uploads/2025/12/NDB_AnnualReport2024_10Dec25.pdf

和发展中国家提供补充性发展融资渠道。截至 2024 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已超过 150 个国家和 30 多个国际组织，相关项目在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领域带动数千亿美元投资，在部分地区显著改善互联互通水平^①。

中国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者，也必将是引领者和贡献者。推进全球治理倡议需要围绕“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三项中心任务，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引领全球南方国家从全球治理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红利受益者”，推动“非西方”式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① World Economic Forum: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urns 10: Here's what to know*, 2023,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3/11/china-belt-road-initiative-trade-bri-silk-road/?utm_source=chatgpt.com

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全球南方”声音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要面向是“对体系中阻碍或不利于更多国家共同发展的体制性、机构性因素进行改革。”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加速，相关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作用都更为突出，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全球南方”声音也更为期待。

（一）建设性参与和渐进式改造

当前，全球治理的结构不合理、机制碎片化、效能赤字等问题加剧，改革完善的需求突出。部分国际机制与规范标准建立于几十年前，严重滞后于当前世界格局的发展大势，无法适应国际秩序变化的要求。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制度性退出和选择性参与，加剧全球治理的“失能”。在此背景下，崛起中的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发挥能动作用，成为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战略力量，在治理体系结构、治理的制度与规范层面都作出积极贡献。

第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均衡。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整体实力发展迅速，不但改变国际力量对比，打破西方长期主导的治理格局，也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者”。全球南方国家要求增加在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扩大制度性权益分配，包括要求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增加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比例。例如，印度、巴西等提出“入常”诉求，非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国家要求增加其区域性代表权，国际社会呼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配额和投票权。联合国秘书古特雷斯提出，全球金融体系“过时、运转失灵且不公正”，“未能履行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全球安全网的使命”。全球南方国家要求世界银行增加全球南方国家的执行董事席位，IMF 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配额与投票权，扩大后者在贷款、债务以及气候治理等议题上的话语权。

第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革新。全球南方国家成为现

有国际机制的“改革者”，其角色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规则和机制的“接受者”，逐渐成为“变革者”甚至“引领者”，为全球治理的合作范式提供新路径。例如，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国家在特定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弥补现有机制的效能缺失。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为陷入发展赤字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印度主导的环印度洋地区联盟、印度洋海军论坛、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萨迦”倡议（SAGAR），以及“全球南方之声峰会”等，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安全与发展合作提供多边平台。金砖国家组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的设立，既体现了各国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意愿，也打破西方国家为全球治理机制创设的垄断。

第三，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规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全球南方国家努力将自身价值规范嵌入全球治理体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升议程设置能力。全球南方国家将自身在价值层面关切的议题，与当前国际治理议程相对接，推动发展议题、安全议题的制度化建设，将减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等议题嵌入全球治理核心议程。要求议程与优先事项需要立足当地，提升机制透明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二是旗帜鲜明提出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治理规范。例如，在气候治理中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能力”原则，主张扩大赠款资金而非贷款形式提供气候融资，确保平等与公平。全球南方国家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将发展、公平以及包容等理念价值嵌入其中。在此过程中，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四大倡议”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新的价值理念，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认同。

（二）公平、发展与效率的三重优先

主权平等与经济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诉求。缺乏主权平等，公平发展的权利就无从谈起，而没有经济发展也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平等。公平、发展、与有效效率优先自然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的主要诉求。

一是公平优先。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多数机制仍由西方主导和

控制，无法反应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变化和人口规模结构，导致在话语权上形成“西方独大”的局面，这种不合理性集中体现在投票权上。例如，美国在 IMF 中拥有 16.49 的投票权，而部分重大决策需要 85% 的多数票，意味着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在 IMF 的投票权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 6 个是发达国家，它们的投票权之和为 40.53%，而剩下的 184 个成员国的投票权仅占不到 60%，显然无法匹配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人口规模。

二是发展优先。发展滞后、发展不足普遍是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急迫问题，因此聚焦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优先，在部分议题上表达核心关切（见表 1），推动一系列强调发展优先的治理议程和国际规范。例如，在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将消除贫困、消除各国之内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促进发展作为重点目标。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其对发展合作和实现繁荣的渴望。在发展需求的驱动下，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大国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包括技术共享、资金援助、基础设施建设等。

表 1：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

主要领域	关切问题	目标诉求
国际金融体系	IMF 与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与份额由发达国家主导	要求份额重组，扩大投票权
新兴科技领域	西方国家形成技术壁垒和技术垄断	主张技术民主化，要求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和共享
债务问题	面临主权债务违约风险	要求债务重组与减免债务
全球气候变化	面临脆弱性风险与资金不足的两难问题	要求西方国家给与气候融资，并承担更多责任
能源与粮食安全	面临脆弱性风险	要求减少地缘政治动荡，确保供应链安全

三是效率优先。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决策程序繁琐和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突出，部分机制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牺牲品。

例如，联合国安理会无论面对乌克兰危机还是美以对伊朗的联合军事打击，都难以通过安理会决议等实现停火止战。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既有机制缺乏治理有效性，各国也尚未达成共识建立新的治理平台。各国围绕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改革等问题，也无法拿出协调各方立场的统一方案。

（三）结构性约束与行动困境

尽管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实力和意愿上升，但面临的系列挑战可能削弱改革成效，甚至阻碍改革取得进展。

第一，全球治理愿景的不确定性。当前，强权政治、地缘政治的回归导致大国在关键议题上共识难寻，部分大国甚至从治理机制的推动者角色转为“绊脚石”。联合国在全球安全、发展治理中的功能弱化，全球治理走向区域化或东西方平行治理模式等悲观预期不断上升。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差异性。全球南方国家的内部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南方国家并非高度团结、“铁板一块”的利益共同体，部分国家因历史或现实问题“相互敌对”，或出于自身利益权衡阻碍共识和机制有效性。例如，因为印度的阻碍，上合组织针对美国联合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的联合声明未采用“谴责”的表述，只表达“严重关切”。二是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治理能力、资源禀赋能力差异大，导致其对参与治理的诉求较为多元化，限制集体行动能力。此外，部分国家国内动荡、政局不稳、腐败盛行等，影响其参与治理体系改革的有效性。

第三，全球治理的“供需矛盾”突出。“供需矛盾”主要指全球南方国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强烈需求，以及大国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方，但特朗普上台后推崇“美国优先”原则，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大幅下降，而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需求又因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性问题的多元化、复杂化而激增，导致全球治理的“供需”张力扩大。新兴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和风险，放大了现有机制的治理能力赤字。

（四）推动改革完善的思路探索

第一，将创新引领作为总体思路。一方面，需要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内部合作，通过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强化集体叙事能力建设，避免因内部差异化而导致集体行动困难，提升“南南合作”的新动能。同时，防止个别国家将双边政治分歧或地区冲突嵌入多边议程，避免治理议程被工具化和地缘政治化，从而导致治理机制陷入“瘫痪”。另一方面，机制建设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环节，也直接影响全球治理的成效。全球南方国家可以继续推动“非西方式”的机制创新进程，贡献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与合作中形成的独特价值理念和集体智慧，成为推动治理机制创新的关键力量。

第二，抓住重点、发掘亮点、用好热点。所谓抓住重点，主要指全球南方国家需要聚焦关键机制的重塑和改革，设定阶段性目标加以推进。在美国加速“退群”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围绕联合国、国际多边机制的改革进程，提出更多的联合倡议、共同方案，提升自身的代表权和制度性话语权。所谓发掘亮点，意味着全球南方国家需要不断探索合作的“新增长点”，尤其是在地区安全、供应链合作、绿色转型，以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领域培育旗舰型项目，构建具有全球南方国家特色的治理模式，推动治理规范的社会化。所谓用好热点，主要指针对热点议题推出全球南方国家的解决方案。不论是地区冲突的政治解决，还是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数据跨区域流动等公共议题，全球南方国家都需要协调立场发出“共同声音”。同时，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路径，回应各国最关心的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繁荣发展贡献独特力量。

三、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全球南方”力量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和平赤字和安全赤字加重，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治理需求随之上升。个别国家以“自我优先”的理念，将安全视为“排他性绝对优势”并组建封闭联盟迫使他国‘选边站队’”，这种“零和博弈”与“集团对抗”的做法正侵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导致国际关系向基于实力的“丛林法则”滑落。此外，相关做法政策和实践可能带来“破窗效应”，引发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担忧、动摇甚至是模仿。如何避免以二元对立的价值立场划界干涉内政，杜绝以经济制裁、长臂管辖甚至军事行动等单边行为取代外交对话途径，破坏对话解决热点问题的政治空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进路。

（一）从规范倡导到行动供给的重要贡献

作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国家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诸多贡献。一是在理念层面，倡导多边主义和中立外交的政治理念，在重大国际争端方面持中立立场，呼吁通过政治对话等外交手段来解决冲突、争端，抵制单边制裁或军事干预，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区冲突议题上，积极发挥劝和促谈、调解斡旋的正向作用。

二是在机制与制度层面，依托已有的地区多边组织或双边渠道（如东盟、拉共体、非盟等），为地区冲突调解与政治对话提供具体的沟通平台。例如，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等对话机制，团结更多力量，汇聚更强声音，为推动停火止战、实现持久和平作出全球南方国家的努力。^①

三是在具体行动层面，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其中，印度、巴基斯坦、中国等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主要出兵国，为冲突地区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和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外，全球南方国家积极落实《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文件，通过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合组织以及其他区

^① 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在联合国成立[EB/OL], 2024-09-28, https://www.mfa.gov.cn/wjzbhd/202409/t20240928_11499637.shtml

域或国际平台，以及与 30 多个国家在香港共同建立国际调解院，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法治力量和注入新的活力。

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合作，本质上是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议得到世界上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一倡议的核心理念与联合国宪章坚守的信念高度契合，^①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形成补充完善。

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在安全保障、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化、政治与外交自主空间等方面存在共同需求。一是在安全保障方面，部分国家面临较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跨境犯罪、族群冲突等威胁，需国际社会协同合作，促进情报共享、装备援助以及改善国家治理能力；二是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强化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需求明显，特别是加强区域组织在危机预警、调解和维和等方面的制度能力保障，这为今后全球南方国家破解区域安全合作困境提供空间；三是在增强政治与外交自主空间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存在迫切需求。为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代理人，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涉及主权和安全方面）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是增强政治与外交自主空间的重要途径。从现实安全保障、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化以及拓展政治与外交自主空间等具有阶梯层次式的安全合作需求出发，为构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提供新生血液和重要补充。

不可否认，全球南方国家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存在诸多挑战。在国家治理层面，各国面临政权稳定性不足、以公共产品供给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效能低下（如法治薄弱、腐败凸显）等风险。由于全球化进程加剧诸多安全问题的联动性与跨境流动，客观上加大发展中国家在诸如领土、能源、水资源等方面引发冲突的可能性。长期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安全治理规范和话语体系，使全球南方国家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困境，个别大国动则“毁约”“退群”

^① 人民网-国际频道，王毅谈全球治理倡议：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EB/OL]，2026-3-8，<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6/0308/c1002-40677306.html>

“脱钩”“筑墙”，甚至直接以武力对部分主权国家领导人、关键基础设施实行“定点清除”，不断侵蚀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削弱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性、有效性，强行阻滞全球南方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进程。最后，全球南方国家面临功能相似的多个国际组织并行所造成的“制度拥挤”效应，如何协调进而更充分地释放各国际组织的“安全”效用。例如，在联合国框架下如何充分整合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处理安全议题的能力，成为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能力的重要发力点。

（二）以“共生安全”为引导实现“发展型安全”

为充分释放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活力，全球南方国家应基于自身历史和现实需求，以“共生安全”理念为指引，探索以发展促安全、以发展保安全的合作模式，通过联合自强实现发展振兴，聚焦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安全秩序的突出挑战，搭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安全合作平台，以落实规范议程、制度议程和关键领域议题的合作方案，展现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共同安全的坚定决心和主动担当，将群体规模转为集体行动效力。

首先，以“共生安全”的理念为引导实现“发展型安全”。坚持“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联合国宗旨，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基石。同时，以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的“六个坚持”为基础，探索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国情，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道路。在此理念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制度化多边协调机制、公共外交以及在国际法实践和危机预警（冲突调停）等方面的经验，为全球南方提供经验或技术支撑。

其次，坚持独立自主、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增强团结协作，为促进区域安全合作奠定（国家）自主性根基**。全球南方国家需要恪守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导向，充分认识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脱离联合国的“另起炉灶”做法不得人心，也不可持续，推动以联合国为基础框架的国际安全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适应 21 世纪动荡多边的复杂国际局势和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坚持发展导向的安全观，将

减贫脱贫、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打击跨境犯罪等治理议题深入嵌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安全目标之中。在深化南南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南北对话，为改革不公正的国际规则，抵制“丛林法则”营造舆论环境，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话语能力。

最后，以解决具体议题的实际行动为导向，推动规范议程、制度议程不断完善。在规范方面，利用联合国、G20 等多边平台，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在与西方国家对话中提升国际舆论的影响力。在制度方面，通过创办、完善全球南方安全论坛、全球南方智库对话会等对话平台，并与其他国际组织（如东盟、非盟等）的危机预防机制进行衔接（例如，通过建立区域粮食、能源储备和供应链、产业链合作机制，减少外部冲击），建立包容性、制度化的安全对话机制。在行动方面，以促进关键领域（如跨境执法、司法改革、反腐败及数字化公共服务等国家治理重点议题）和新兴领域（如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规则主导权）的安全合作为牵引，提升以公共服务供给为基础的国家治理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奠定内生力量。

表 2 “全球南方”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议程

维度	具体做法
规范议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弘扬万隆精神，凝聚南方国家共同价值； 2. 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新型安全理念； 3. 确立四大“力量定位”，明确南方国家集体责任
制度议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推动传统国际制度改革，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如以“汇集投票”方式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增资和占比调整；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主张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升中小国家参与机会； 2. 创建和扩大金砖国家、上海组织、77 国集团-中国等平台，实现联合自强； 3. 创新区域协调机制与提升治理效能，加强东盟、非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地区机制的协调，通过上合组织的扩员式发展及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

	盟等平台的建立，促进“全球南方”从“对话论坛”向“行动网络”转型；
行动议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连续4年由全球南方国家担任； 2. 主动介入地区冲突的调停中，中国与巴西在联合国发起“和平之友”小组等； 3. 在粮食、能源安全领域，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技术示范，提升粮食生产；中印携手在非推广光伏技术，解决撒哈拉以南地区用电问题； 4. 新兴治理领域抢占规则制定权，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文件，提出共同研发新一代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正成为推动全球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尽管在地缘环境、社会结构与文化、政治体制等方面差异颇大，但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具有增强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促进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化以及拓展政治与外交自主空间的集体诉求与共识。全球南方国家以“共生安全”理念为引导，以“独立自主、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合作思路，通过规范议程、制度议程和关键议题合作加以落实，有助于维护多边主义这一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底色，为推动区域安全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四、打造韧性包容供应链的“全球南方”优势

面对大国博弈竞争升级，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曲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加速重构，坚决践行全球化理念，加强供应链“南南合作”，携手构建公平、韧性、包容的供应链体系，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维护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的努力方向。

（一）基于全球投入产出网络的地位跃迁与功能重塑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 ICIO 数据^①，以及联合国 ISIC Revision 4 的行业分类标准划分为 45 个行业的统计可以看到，1995-2020 年间，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南方出口至北方、北方出口至南方以及全球北方内部的贸易规模持续增长^②。（见图 1）

^① ICIO 数据涵盖 77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38 个 OECD 国家（或地区），38 个非 OECD 国家（或地区），以及 1 个将其余所有国家和地区加总形成的“世界其余地区（Rest of the world, ROW）”，时间跨度覆盖 1995—2020 年共计 26 年，为确保测算结果准确，本文剔除 ROW，只考虑单个国家（或地区）间投入产出关系。

^② 对于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划分方式，目前尚无完全统一的界定标准。本研究参考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对全球南方的界定方式，将“77 国集团和中国”视作全球南方。对应到 ICIO 数据中，共有 36 个国家（或地区）属于全球南方，具体包括：阿根廷、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智利、中国、科特迪瓦、喀麦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埃及、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印度、约旦、哈萨克斯坦、柬埔寨、老挝、摩洛哥、墨西哥、缅甸、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中国台北、乌克兰、越南、南非；共有 40 个国家（或地区）划为全球北方，具体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瑞士、塞浦路斯、捷克、德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克罗地亚、匈牙利、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立陶宛、卢森堡、拉脱维亚、马耳他、荷兰、挪威、新西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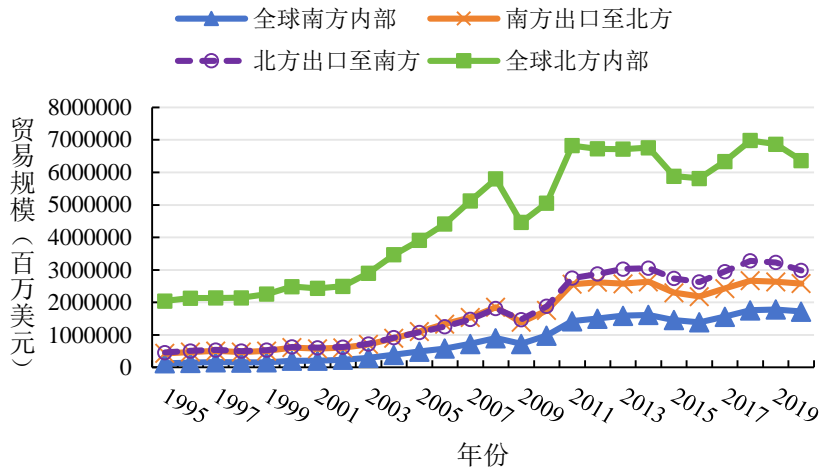


图 1 南北方贸易规模演变趋势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国家间依赖度指标，考察南北方之间的依赖指数：

$$Dependency\ Index = \frac{\sum_{j \in S} a_{ij}^{District}}{\sum_{k \in S} a_{ik}^{District}} \quad (1)$$

上式中，分子表示南方国家（或地区） i 对北方国家（或地区） j 的贸易量，分母表示南方国家（或地区） i 对南方国家（或地区） k 的贸易量， S 代表南方国家（或地区）的集合。该指标值越大，说明从总体来看，全球南方对全球北方的依赖程度越高，反之则说明依赖程度越低。类似地，将数据集 S 更换为北方国家的集合 F ，用 i 代表北方国家（或地区）而用 j 代表南方国家（或地区）时，相同指标即体现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依赖指数。测度结果总结至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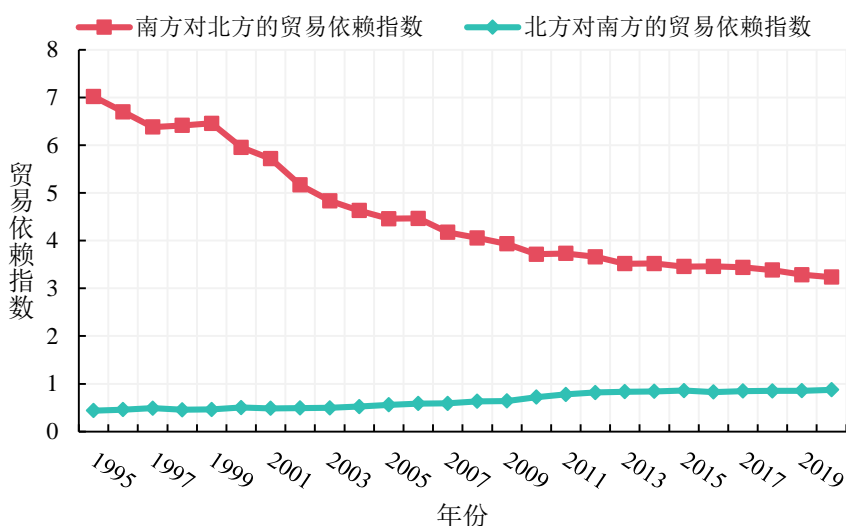


图2 南北方贸易依赖指数演变趋势

可以看到，全球南方国家在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中发生重大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结构出现根本性重塑，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贡献随时间推移愈加突出。

第一，全球南方内部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基于绝对贸易规模来看，全球南方内部贸易增长最快，从1995年的1279.9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17199.5亿美元，增长13.4倍；而南北方之间的贸易总额仅增长5.2倍，内部贸易增速显著快于外部。这一结构性变化体现全球南方内部合作边界不断拓展，对北方贸易依赖度持续下降，全球南方产供应链自主可控程度正在不断增强。2020年全球南方内部贸易额已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3.4%，较2000年提升11.7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使全球北方不得不正视“南方力量”的崛起。

第二，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合作造成重创。由图1可见，不论是全球南方、北方内部还是南北方之间的贸易规模均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断崖式下降，其中尤以全球北方内部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尽管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量曾一度回温，但2015年前后全球贸易规模再次缩水。期间，全球北方内部的贸易规模回撤最快，由2014年的67602.5亿美元迅速下滑至2015年的58828.8亿美元。相较之下，全球南方在几次危

机中彰显出较强韧性，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北方，代表新兴市场为支撑全球增长贡献主要力量。

第三，全球南方和北方在全球贸易格局的地位发生深刻变化。

图 2 直观地展现出全球南方对北方的依赖指数呈系统性下降趋势，从 1995 年的 7.0172 持续降至 2020 年的 3.2348，降幅达 54%，表明全球南方正通过加强内部合作重构其贸易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与全球南方对北方依赖程度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全球北方对南方的依赖程度长期来看呈现波动上升，从 1995 年的 0.4398 上升至 2020 年的 0.8736，增幅达 98.6%，表明南北方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正发生深刻变化。由此可见，全球南方正通过持续深化内部贸易合作，推动全球贸易体系向更加平等、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能力约束与外部冲击的双重压力

尽管全球南方在投入产出网络中的贡献和地位正与日俱增，但同样需要客观承认的是，全球南方产供应链仍面临诸多挑战，具体可从内部阻碍和外部威胁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南南合作”规模不足且范围有限，亟待提质增效。

尽管全球南方内部贸易合作水平逐年稳步提升，但就绝对规模而言仍显著低于全球北方内部与南北方之间。2020 年，全球南方内部贸易规模为 17199.5 亿美元，而同期全球北方内部对应数值为 63688.3 亿美元，相差 3.7 倍之多。此外，进一步分析国家-行业节点可以发现，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北方国家嵌入全球产供应链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如表 3 所示，美国在服务业领域独占鳌头，相较之下，中国的优势仍然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且第三产业方面与美国差距较为明显。

表 3 全球产供网络中关键节点的中心度排名

国家-部门	2014 年		2017 年		2020 年	
	中心度	排名	中心度	排名	中心度	排名
美国-批发零售业；机动车修理	7.70	1	8.36	1	8.98	1
美国-房地产	6.81	2	7.72	2	8.75	2
世界其他地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6.81	3	4.94	10	4.98	13
中国-基本金属	6.66	4	6.83	3	8.32	3
中国-建筑业	6.26	5	6.78	4	8.17	4
美国-金融和保险	5.88	6	6.70	5	7.55	5
美国-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	5.75	7	6.14	7	7.17	7
美国-专业、科学和技术	5.26	8	6.26	6	7.22	6
美国-健康和社工活动	4.54	9	5.25	8	5.64	8
美国-建筑业	4.34	10	5.06	9	5.53	9
中国-食品、饮料、烟草	4.16	11	4.72	11	5.05	11
中国-农业、狩猎和林业	4.08	12	4.30	12	5.18	10
中国-批发零售业；机动车修理	3.98	13	4.24	13	5.04	12
中国-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	3.51	14	3.63	15	4.10	16
美国-食宿服务	3.49	15	3.92	14	3.50	18
中国-化学品	3.40	16	3.37	18	3.63	17
美国-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	3.38	17	2.92	21	2.73	29
中国-纺织品、服装和皮草	3.20	18	3.44	16	4.27	14
美国-食品、饮料、烟草	3.09	19	2.88	22	2.87	26
中国-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	3.04	20	3.43	17	4.22	15

美国-教育	2.88	23	3.14	19	3.36	19
中国-专业、科学和技术	2.71	25	2.71	24	3.34	20
美国-行政和辅助功能	2.60	27	3.01	20	3.30	21

数据来源:沈洁,杨飞洋,史亚东. 基于投入产出数据的全球生产网络结构特征与风险识别研究 [J]. 区域经济评论, 2025, (01): 130-143. DOI:10.14017/j.cnki.2095-5766.2025.0014.

总体来看,南方国家的优势节点主要集中在资源开采、初级产品加工与农林牧副渔方面,仍承担着资源与基础材料供应者的角色。同时,北方国家的关键节点则高度集中于服务业与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如金融和保险活动、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仓储运输等,突显其在资本、物流与专业服务领域的控制力与绝对优势。这种节点中心度分布的差异本质上是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结构体现,南方国家多位于曲线底部的生产环节,优质资源的流动基本聚集于“北-北”“南-北”之间,南方国家在价值链地位、产业联系紧密度、供应链完整程度等方面仍具备极大拓展潜力和空间。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紧张复杂威胁全球南方产供应链稳定安全。近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在挑拨、分裂南方国家间合作意志,试图孤立、排除中国、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拉拢、威逼和利诱其余全球南方国家,对南南合作构成主要障碍。2018年,美国无端挑起对华贸易摩擦,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两大核心力量,美中贸易争端迅速推高了全球贸易不确定性水平,直接影响到产供应链体系中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和全球价值链参与意愿。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频繁挥舞制裁“大棒”,滥用出口管制、关税、实体清单等保护主义手段,全球产供应链脆弱性日益突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曾指出,“美国加征关税给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带来的打击最为沉重,这些国家的出口额或会下降超 50%,可能严重影响其社会稳定”^①。随着来自

^① Nuran Erkul, “Bigger impacts of US tariffs to be felt next year, with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acing major risks: UNCTAD”, Anadolu Agency, <https://www.aa.com.tr/en/economy/bigger-impacts-of-us-tariffs-to-be-felt-next-year-with-least-developed-countries-facing-major-risks-unctad/3648094>.

“全球北方”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加，南方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调整对外经济政策，表现为由“追求绝对收益的对外开放”到“强调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应链安全”的战略转向。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叠加国家战略理念的转变，深刻改变全球供应链空间布局的同时，也让全球南方内部推动供应链合作进程变得更加艰难。

（三）从“被动嵌入”到“主动塑造”的优势拓展

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奉行保护主义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正在减少对北方国家的依附，转而寻求通过“南南合作”加深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弥补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贸易风险与潜在损失。不过需要重视的是，南方国家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核心诉求各不相同，目前尚无统一的机制和框架引导南方国家有序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因此，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实现突破，产供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新形势下，全球南方国家亟待超越传统思路，尽快推进改革，携手构建更为公平、韧性、包容的供应链合作平台。基于中国视角出发，可以基于以下三个维度为全球南方供应链合作贡献力量。

首先，以开放包容为原则，在现有南南合作机制框架下，提议设立供应链技术协调小组，聚焦数字基建、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关键领域，推动南方国家间在经贸领域的标准互认与数据共享。如依托扩容后的“金砖+”机制，在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间率先建立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协同机制，成功经验向其余南方国家推广和复制。目前，“金砖+”成员国间经贸与投资关系正不断深化，如巴西增加来自中国的电子产品与新能源汽车进口，同时为中国提供大豆和铁矿石；印度尼西亚吸纳了更多来自中国的机械与纺织业投资，并增加对中国的煤炭与镍矿资源供应^①。在“金砖+”框架基础上，逐步增强全球南方供应链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是兼具现实基础与拓展前景的最优路径。

其次，以《全球发展倡议》为指导，以“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为依托，积极寻求南

^① The Economists, “Can the world’s free-traders withstand Trump’s attack?”,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5/04/02/can-the-worlds-free-traders-withstand-trumps-attack>.

方国家间利益交集，主动塑造外部环境，构建优势互补、各取所需的产供网络。如“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中国的产能优势、市场规模与该地区的人口和资源优势互补性强，已有多家中国新能源企业与阿联酋、阿曼等国开展碳捕捉、太阳能光伏发电、氢能等能源项目合作^①。在“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南方国家在能源、关键矿产、农业、制造业等多个产供应链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同时，南方国家的自主平等意识也在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不愿过度依赖外部力量，期待通过平等互利的国际经贸合作促成自身生产力的长期稳定增长。这一理念与《全球发展倡议》高度契合，更代表着“全球南方”将成为重塑全球产供应链体系和改进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关键依托。

最后，以跨境援助为路径，分享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低碳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展现大国担当，支持南方国家充分调动潜能，发挥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事实上，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坚定一员，始终致力于推动完善与南方国家间的合作机制，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如中国企业对非洲融资投资建设了大量铁路、公路、港口、能源设施及工业园区，显著提升了非洲的互联互通水平和经济发展能力，为非洲产业链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此外，鼓励南方国家间增加双边投资，降低中小国家参与产供应链门槛，强化本地化能力建设。举例来说，中国有色金属集团通过投资赞比亚铜矿、建设冶炼工业园，有效提升了当地矿业附加值；中国农业企业也在非洲建设多个农业种植园，通过配套建设农产品加工厂等方式帮助推动当地农业生产效率，有效延长农业产业链和生产环节附加值^②。国际投资能够有效克服本土企业发展可能出现的路径依赖问题，推动真正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可持续合作生态。

^① KPMG,“新能源企业出海系列之驶向中东”,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sites/cn/pdf/zh/2024/09/middle-east-new-energy-market.pdf.coredownload.inline.pdf>.

^② 余南平,赵明昊,陆如泉,等. 贸易关税冲击下“全球南方”价值链的调整与应对 [J]. 西亚非洲, 2025, (06): 3-39+175.

五、迈向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的“全球南方”经验

脱碳向绿发展是国际社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协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永续发展的共同努力方向。随着美国再度退出《巴黎协定》拒绝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在联邦层面逆流推动重振油气、煤炭等传统石化产业，欧盟携市场规模单方面强推“碳关税”损害全球公平贸易环境等新形势下，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进程遭遇重大逆流。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顶住压力积极合作，通过相互协作克服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援助缺位导致的不利影响，为全球迈向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做出积极贡献。

（一）推动绿色发展的动能和贡献

全球南方持续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完善并落实自主贡献责任，在可再生能源部署、制度规范塑造和南南合作等方面形成系统性发力，不仅在减排实践上取得实质进展，也在治理理念与机制层面提供了重要补充与创新。

在实质脱碳方面，全球南方已成为全球绿色能源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 年全球南方贡献了 80% 以上的绿色能源生产，通过强化国家自主贡献（NDC）执行，在装机规模和增速上实现对北方国家的全面超越。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2025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报告》，2024 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总容量达 4448 GW，南方国家是主要动力。新增装机容量 72% 集中在亚洲，中国贡献了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近 64%。^①这一趋势不仅有效弥补全球减排缺口，也削弱了“南方减排消极”的既有叙事。

^①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Renewable Capacity Statistics 2025*. Mar. 20 25,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5/Mar/IRENA_DAT_RE_Capacity_Statistics_2025.pdf.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Renewable Capacity Highlights 2025*. Mar. 20 25,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5/Mar/IRENA_DAT_RE_Capacity_Highlights_2025.pdf.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Record-Breaking Annual Growth in Renewable Power Capacity.” 26 Mar. 2025, <https://www.irena.org/News/pressreleases/2025/Mar/Record-Breaking-Annual-Growth-in-Renewable-Power-Capacity>.

在制度规范层面，全球南方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对“统一减排论”，推动确立“发展与绿色并重”的治理逻辑。通过将绿色转型嵌入工业化进程，全球南方证明了减排与发展可以实现协同推进。2025 年全球南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增幅连续四年超过化石燃料，打破了“去工业化脱碳”的单一路径，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可复制的转型范式。

在模式创新方面，依托南南合作逐步构建相对独立的绿色转型路径，形成区别于传统南北援助的平行治理网络。一是合作重心向区域内回归，通过电网互联、绿色电力交易等机制强化区域协同，有效消化快速增长的装机需求并支撑风光发电扩张。以印-尼-孟三方电力交易和东盟（ASEAN）电网计划为例，其通过区域协作消化了本地区激增的绿色装机需求（截至 2024 年底，东盟地区的风能和太阳能合计装机容量已突破 28 GW），支撑了南方国家风光发电量 23% 的高速增长。^①二是推动产业链本土化，由“技术输入”转向“体系落地”，在本地构建完整产业链条，削弱对外部技术的结构性依赖。三是加强集体协调，通过“G77+中国”、基础四国等平台强化集体行动，在 COP 等多边场合协同发声，将气候融资与历史排放责任挂钩，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议程塑造能力。^②

（二）发展约束下的多重诉求

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追赶者，全球南方在推进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过程中形成区别于北方国家的复合型诉求，其核心不仅在于资金与技术供给，更在于在不平等治理结构下对发展权的再确

^① Smith, Janna, et al. “2024 年东南亚之巅的竞赛：自去年以来，东南亚的太阳能和风能运营容量增长了五分之一，但只有 3% 的潜在项目在建设。” *Global Energy Monitor*, Jan. 2024, <https://globalenergymonitor.org/zh-CN/report/a-race-to-the-top-southeast-asia-2024-operating-solar-and-wind-capacity-in-southeast-asia-grows-by-a-fifth-since-last-year-but-only-3-of-prospective-projects-are-in-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ntegrating Solar and Wind in Southeast Asia*. Executive Summary, 2025, <https://www.iea.org/reports/integrating-solar-and-wind-in-southeast-asia/executive-summary>.

^② Group of 77 and Chin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2024*. 2024, <https://www.g77.org/doc/Declaration2024.htm>.

Group of 77 and Chin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2025*. 2025, <https://www.g77.org/doc/Declaration2025.htm>.

认，集中体现为能源可及性、融资与技术、公平发展路径以及技术适配等多维需求。

首先，能源转型与能源可及性并行成为基础性诉求。全球南方既需承担减排责任，又面临消除能源贫困、推进工业化的现实压力。当前全球仍有约 6.75 亿人口无电可用、约 23 亿人口缺乏清洁烹饪条件，在基础设施薄弱地区，低成本化石能源仍具现实必要性。^①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绿色转型不应以牺牲民生用能为代价，关键在于在减排目标与基本发展权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确保绿色发展成果具有普惠性。

其次，拒绝北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信用歧视和债务陷阱。全球南方绿色转型成本显著高于北方。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2024-2025 年的跟踪数据，融资利率通常更高，例如典型公用事业级太阳能项目的资本成本通常可达发达经济体或中国的 2—3 倍，叠加信用评级偏差与担保依赖，形成结构性“融资歧视”。^②与此同时，约 90% 的低碳技术专利集中于发达国家及少数经济体，技术封锁与“成品输出”模式加剧产业链依附。^③由此，全球南方提出将气候资金由附条件援助转向基于历史排放责任的制度性义务，并推动改革国际金融架构与知识产权体系，将关键绿色技术界定为全球公共产品。

再次，发展与环保平衡的诉求。受历史排放与碳空间挤压影响，全球南方面临“发展—减排”双重约束。能源可负担性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减贫进程，而发达国家已占用约 80% 的碳空间并完成工业化，使南方国家在承担环境责任时缺乏对等条件。因此，其核心诉求在于推动发展与绿色转型的协同路径，避免在不对称责任格局下被迫以发展权换取减排义务。

^① United Nations News. “可持续发展目标 7: 全球 6.75 亿人无法用上电。” 12 July 2023,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07/1119682>.

^②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Bringing down the Cost of Capital Is Key to Unlocking Clean Energy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 *IEA*, 8 Feb. 2024, <https://www.iea.org/news/bringing-down-the-cost-of-capital-is-key-to-unlocking-clean-energy-growth-in-emerging-economies>.

^③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Quantifying Digital Innovation for the Twin Transition. OECD Environment Working Papers*, no. 261, May 2025,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5/05/quantifying-digital-innovation-for-the-twin-transition_8f152498/8cc4cff0-en.pdf.

最后，对技术普惠及本土适配性的需求。一方面，北方主导的技术体系与南方国家在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上的差异较大，难以直接移植；另一方面，南方内部已形成多样化转型路径，如中国的规模化产业链模式、印度的分布式能源模式、巴西的生物燃料路径等，更具本土适配性。但南南合作同样面临环境差异、制度条件与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制约技术扩散效率。因此，推动技术普惠的同时强化本地化改造能力与标准协调，成为提升绿色转型可持续性的关键环节。

（三）不对称结构中的绿色转型困境

不可否认，全球南方的绿色转型面临多重结构性约束。这些困境不仅源于自身发展阶段，更与北方国家在规则、融资与技术领域的制度性优势及其战略运用密切相关。

一是发展与脱碳的平衡困境。发达国家在完成“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进程后，占用了约80%的历史排放空间，却要求尚处工业化中前期的南方国家同步实现发展与深度脱碳。^①在统一净零标准和严格碳规则约束下，南方国家被迫承受高成本转型压力。与此同时，北方国家通过技术垄断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绿色壁垒，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使南方国家在发展与减排之间陷入双重约束，甚至出现产业回流北方的趋势。

二是气候治理国际秩序的结构不公。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规则、议程与责任分配仍由北方主导，将复杂的转型问题简化为单一减排标准，并与贸易和地缘政治议题绑定。在责任分配上，尽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已被确立，但北方国家倾向于以“当前排放”替代“历史责任”，削弱补偿义务，将气候议题工具化为产业竞争与规则博弈的手段，使全球南方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三是资金与技术壁垒削弱转型能力，并加剧对北方国家的依附关系。融资方面，全球南方高度依赖外部借贷，受制于由北方主导的信用评级体系，面临高利率与风险溢价，形成“减排即负债”的困境。部分国家偿债负担甚至超过其绿色投资规模。技术方面，关键低碳技术专利在全球北方国家高度集中。例如，南方

^①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3 年排放差距报告. 2023, <https://www.unep.org/interactives/emissions-gap-report/2023/zh/>.

国家虽在光伏板制造等低端应用层占据产量优势，但在绿氢、CCUS等核心关键技术上，北方国家却掌握 70%以上高价值专利。^①北方国家更倾向于向全球南方输出成品设备，使全球南方只能依靠设备进口，在产业链及后续维护等方面长期处于技术依附。北方国家往往将资金援助与技术绑定，全球南方国家被迫接受高成本且适配性不足的解决方案，长期锁定在产业链低端。

四是气候治理中的分歧削弱集体行动能力。南北之间的核心矛盾集中于责任认定、资金补偿与发展路径：北方国家强调现在碳排放量，试图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淡化为“共同责任”，而南方国家主张北方国家占据大部分的碳排放空间，必须承担主要减排责任，并援助全球南方国家减排（CBDR 原则）。北方国家倾向于通过附加严苛条件（透明度核查）的贷款提供资金，实际上是将气候治理与贸易挂钩，将援助变换成交易。南方则认为基于气候正义，北方国家的资金补偿应以赠款为主。北方国家要求全球统一设定 2050 净零时间表。南方坚持发展优先，主张根据国情自主决定峰值时间。南北间的分歧是基于气候正义与权力逻辑的对抗，使资金和技术的援助停留在口头承诺。与此同时，南方内部在减排时间表、能源结构选择及技术能力方面亦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在具体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立场，削弱整体谈判能力，并为外部力量分化提供空间。^②

（四）绿色转型路径与合作议程重塑

第一，包容性发展校准转型方向。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绿色转型，将绿色产业与本地就业深度绑定，推动从设备引进走向本地组装、维护乃至本土研发一体化，吸纳传统能源部门转移劳动力。

^①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and European Patent Office. *Hydrogen Patents for a Clean Energy Future*. 2023, <https://www.iea.org/reports/hydrogen-patents-for-a-clean-energy-futur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ydrogen Patents Indicate Shift towards Clean Technologies such as Electrolysis, according to New Joint Study by IEA and EPO.” 9 Jan. 2023, <https://www.iea.org/news/hydrogen-patents-indicate-shift-towards-clean-technologies-such-as-electrolysis-according-to-new-joint-study-by-iea-and-epo>.

^②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rt. 3,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eng.pdf>. Group of 77 and Chin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2024*. 2024, <https://www.g77.org/doc/Declaration2024.htm>. Group of 77 and Chin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2025*. 2025, <https://www.g77.org/doc/Declaration2025.htm>. Group of 77 and China. “Second Committee General Debate.” 7 Oct. 2024, <https://www.g77.org/statement/getstatement.php?id=241007>

以南非“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为例，其将资金优先用于煤矿工人技能重塑与区域经济多元化，避免资源型地区在脱碳中“空心化”。同时，以能源可及性为优先，通过分布式光伏与微电网实现“跨越式供能”，使未通电地区绕开传统化石能源路径，将脱碳与减贫形成闭环。^①此外，通过社会保障与转型补贴对冲能源价格波动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提升政策可持续性。

第二，技术普惠降低转型门槛。推动气候技术由私有产权向公共产品属性转变，在关键领域探索专利豁免与国际技术池机制，降低获取前沿技术的制度性成本。依托南南合作，实现从“设备输出”向“技术、人才输出”的模式转变。强化本土二次开发能力。例如，在“中非绿色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国通过与当地大学联合开展针对非洲特殊地理条件的分布式能源研发，实现了技术从“实验室”到“本土化应用”的深度贯通，夯实了受援国的技术内生动力。^②同时，借助金砖国家、“一带一路”等平台构建自主技术创新网络与标准体系，在气候监测、数据共享等领域逐步摆脱对西方技术与数据的单一依赖。

第三，金融创新重构资金支撑。围绕融资成本不对称问题，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基于气候贡献与发展潜力的信用评估框架，削弱对全球南方的“融资歧视”。在实践层面，通过债务减免与绿色投资挂钩，将外债压力转化为转型动力，如债务置换生态保护或绿色项目投资。以2023年中国和埃及签署的“债转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代表，探索本币结算与产业嵌入相结合的新型债务安排，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依托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多边机制，构建面向全球南方的绿色资本内循环，提高资金供给的稳定性与自主性。^③

^① The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President Ramaphosa Outlines South Africa’s Just Energy Transition Investment Plan.” 4 Nov. 2022, <https://www.presidency.gov.za/president-ramaphosa-outlines-south-africas-just-energy-transition-investment-plan>.

The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Remarks by President Ramaphosa to the Presidential Climate Commission on the Just Energy Transition Investment Plan.” 4 Nov. 2022, <https://www.presidency.gov.za/remarks-president-ramaphosa-presidential-climate-commission-just-energy-transition-investment-plan>.

^②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eijing Action Plan (2025-2027)*. 2025, https://www.focac.org/eng/zywx_1/zywj/202506/t20250616_11649686.htm.

^③ Egypt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 “Al-Mashat Signs 3 MoUs with the NDRC and the

第四，南南协同推动转型落地。以产业链整体转移替代单一设备输出，在受援国构建涵盖生产、配套与服务的本地化绿色产业体系，增强内生发展能力。在技术层面，通过高适配设计、分布式部署与模块化维护，降低复杂技术对基础设施与专业能力的依赖。依托模块化组件与数字化手册，实现本土维修力量的短时间培养。同时，创新开发性金融模式，将融资直接嵌入具体工程项目，以项目收益偿还贷款，形成“项目自偿”的闭环机制，即便在财政约束下也能维持运行，提升转型韧性。

第五，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公平化改革。面对不公平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全球南方不应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应通过南南合作在金融、技术、规则等领域推动公平化改革，在多边框架内强化协调，通过基础四国、金砖国家等国际机制共同发声，弥补气候治理领导缺位。在南北互动中，对接欧盟等相对积极力量，推进绿色供应链标准互认与制度兼容。利用欧盟对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角色期待进行战略对冲，协调南北立场以提升整体气候治理效率。^①同时，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由原则走向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明确北方国家“历史排放债务”，为南方国家争取损失与损害的法律补偿权，实现从“气候援助”向“气候赔偿”的转变。

在此基础上，依托金砖国家、“一带一路”等南南合作平台，加速构建去北方中心化的绿色金融与技术内循环。利用已有全球南方绿色金融机制加强开发性金融利用，摆脱对北方有条件援助的路径依赖，构建抵御汇率波动与信用霸权的绿色金融内循环。针对西方国家设立绿色技术壁垒，全球南方应通过南南合作建立自主碳足迹核算、绿色产品认证及环境、社会与治理标准体系。通过资金、技术、规则领域的改革，使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向公平化发展。

CIDCA.” 11 July 2025, <https://sis.gov.eg/en/media-center/news/al-mashat-signs-3-mous-with-the-ndrc-and-the-cidca/>. Egypt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 “Egypt, CIDCA Mull Ways to Enforce MoU on Debt Swap.” 13 June 2024, <https://sis.gov.eg/en/media-center/news/egypt-cidca-mull-ways-to-enforce-mou-on-debt-swap/>.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2023*. 2023, https://mediadr.sis.gov.eg/bitstream/handle/123456789/45847/MOIC20231217_2132.pdf?isAllowed=y&sequence=3.

^① 关孔文、王强，《重塑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全球南方”所面临的挑战与改革路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12—19页。

六、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建章立制的“全球南方”实践

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中不再被动顺应既有的外部规则，而是依托本土丰富的应用生态与多元的现实诉求，日益成为人工智能前沿规范的孵化阵地与议题引领力量。面对发达经济体主导话语权与技术壁垒加深的现实，全球南方既面临技术依附与规范边缘化风险，也在探索以发展为导向的治理路径，并通过制度构建、能力补强与多边协同提升整体议价能力。驱动人工智能治理生态向更加公正、均衡且包容的形态演进。

（一）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南方实践与制度外溢

全球南方正由规则接受者转变为“场景供给者与制度试验者”，在多元应用与发展导向中为全球治理提供现实支撑。一方面，南方国家在教育、医疗、农业、灾害预警、社会救助等领域形成大量可验证的应用场景，为“可解释、可问责、可持续”的治理框架提供现实检验。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中更强调发展导向与普惠目标，把“数字鸿沟、能力建设、公共利益、技术可得性”纳入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议程，推动治理逻辑由风险主导向发展导向延展。

第一，场景驱动的治理验证。在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合作已在防灾减灾和医疗卫生等直接关系民生安全的领域形成较为清晰、可核实的应用场景。以中国气象局在 2025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发布的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MAZU）”为例，其核心产品“MAZU-Urban”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已向吉布提、蒙古国交付，并自 2025 年 1 月起在亚洲、非洲及大洋洲 35 个国家和地区试用，成为面向发展中国家共享早期预警能力和防灾减灾经验的代表性案例。^①第 31 批援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在中几友好医院引入骨科 AI 辅助仪器、手术机器人等技术，并与当地医

^①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AI-powered meteorology supports Early Warnings for All,” July 29, 2025.
<https://wmo.int/media/news/ai-powered-meteorology-supports-early-warnings-all>.

生共同探索适应本地条件的操作规范。^①这些案例表明，相关国家正围绕早期预警、远程筛查、辅助诊断和基层能力建设等具体场景，把人工智能逐步转化为能够服务公共治理和民生改善的现实工具。

第二，通过区域型开源模型建设探索治理路径。以新加坡 AI Singapore (AISG) 推动的 SEA-LION 计划为例，该系列模型面向缅甸语、菲律宾语、印尼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泰语、越南语等多种东南亚语言进行预训练与指令微调，回应本地区长期面临的语言结构差异、语码转换与本地文化知识缺失等问题。^②在技术路径上，Qwen-SEA-LION-v4 由 AISG 主导、结合阿里巴巴 Qwen 基座完成区域化增强，降低西方通用模型在区域语境中可能出现的理解偏差与风险。^③此外，通过轻量化与量化版本降低部署门槛，该模型得以在资源受限的终端环境中运行，为中小企业与公共部门提供更可负担的本地化 AI 能力。

第三，推动产业赋能与治理议题联动。在拉美地区以巴西为代表，围绕可持续发展与产业升级构建高价值应用场景。例如，中国与巴西成立中巴科技创新中心，聚焦能源领域前沿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探索传统能源清洁开发、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发展路径。在农业领域，通过数据分析与智能调度优化大豆、咖啡等作物的全流程管理，提升供应链效率与国际竞争力。同时，借助金砖机制推动区域技术协同，分享人工智能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应对等领域的实践经验，带动阿根廷、智利等拉美国家构建适配自身需求的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治理从单一技术应用走向“产业赋能+生态保护”的协同治理。

^① 近六十载的坚守——中国医疗队用“技术赋能”为几内亚民众架起“生命之桥”，央视网，2025年5月12日。

<https://news.cctv.com/2025/05/12/ARTIzDQZweLMuoYqwtwV0hg3250512.shtml>

^② AI Singapore,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in One Network Data (SEALD),”

<https://aisingapore.org/aiproducts/southeast-asian-languages-in-one-network-data-seald/>

^③ Singapore, “Qwen-SEA-LION-v4-32B-IT,” Hugging Face, October 16, 2025.

<https://huggingface.co/aisingapore/Qwen-SEA-LION-v4-32B-IT>

（二）从原则共识走向制度落地的治理需求

全球南方当前的核心关切，在于将既有“原则共识”转化为“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在复杂内外环境下，其不再被动承接西方合规框架，而是围绕三类关键需求展开制度化探索与多边实践。

第一，重塑“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制度逻辑。全球南方国家亟需构建适配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基本法与配套规制，系统覆盖数据治理、算法问责、公共采购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领域，并形成风险分级、影响评估、审计认证与救济机制等政策工具。在此过程中，南方国家强调以发展与普惠为导向，将数字鸿沟、能力建设与技术可得性纳入核心议程，推动全球规则由“风险优先”向“安全—发展”双目标平衡转型。围绕这一方向，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牵头推动了多项决议。2023年10月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发展、安全、治理提出十一项主张，明确“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坚决反对以技术垄断和单边制裁制造发展壁垒。^①2024年7月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成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的里程碑事件。^②202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聚焦民生福祉、科技进步、产业应用、文化繁荣、人才培养五大方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发展赋能与治理规范两个层面提供制度路径，强化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农业与减贫等领域的应用导向。^③

第二，围绕能力短板构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面对技术壁垒与制度能力不足，南方国家的需求已由理念认同转向对开源技术、算力资源与合规工具的实质获取，核心在于提升制度供给与技术吸收能力。为切实解决能力建设不足的痛点，2025年7月，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将其定位为重要的国际

^①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年10月20日。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310/t20231020_11164831.shtml

^②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apacity-Build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RES/78/311, July 5, 2024. <https://docs.un.org/en/A/res/78/311>.

^③ 李强在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5年9月24日。
<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50924/ee1d8baa009b4989942a9338bdf13aeb/c.html>

公共产品。该组织以深化创新合作、推动普惠发展、加强协同共治为目标，致力于通过开放包容机制凝聚国际共识，推动建立适配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治理标准与技术规范。与此同时，通过扎实落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持续举办多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及主题对话会，直接向全球南方国家分享治理经验与技术成果，从实操层面填补了南方的能力建设缺口。

第三，通过机制协同强化规则塑造能力。全球南方单一国家难以应对外部技术封锁与规则压力，推动区域与多边层面的标准互认、数据流动规则对接及算力与模型资源共享，成为提升集体议价能力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多边机制的协同效应逐步显现：金砖合作框架下推动人工智能议题制度化，促进治理经验在成员间扩散（如巴西在亚马逊雨林保护中的人工智能应用治理经验便通过该机制实现了区域共享）；东盟依托《东盟人工智能治理与伦理指南》，聚焦数据跨境流动、算法公平等核心议题，积极探索适配东南亚多元文化的可持续治理模式^①；非洲联盟则通过《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将人工智能治理纳入数字经济全局，强调建立非洲本土的治理框架^②。这些制度实践相互叠加，正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向更加多元与包容的方向演进。

（三）外部环境约束与自身能力瓶颈

当前，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呈现明显碎片化特征。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框架难以回应发展中国家核心关切，内外因素交织使全球南方在构建自主、均衡、可持续治理体系过程中面临多重结构性约束。

第一，技术封锁与闭源生态强化依附格局。部分发达国家凭借在高端芯片、核心算法与算力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垄断地位，通过出口管制、技术限制与市场壁垒等手段，极力维护自身技术霸

^①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Guide on AI Governance and Ethics,” February 2, 2024.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4/02/ASEAN-Guide-on-AI-Governance-and-Ethics_beautified_201223_v2.pdf.

^② African Un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for Africa (2020-2030),”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8507-doc-dts-english.pdf>.

权与治理主导权。例如，美国与欧盟等相继出台针对人工智能核心硬件、精密制造设备与关键软件的限制性政策，导致全球南方国家算力供给严重不足，无法支撑大模型训练与治理工具自主研发，被迫依赖西方技术。此外，西方闭源模型的不确定性供给进一步放大治理风险。以 GPT、Gemini 为代表的主流闭源模型对南方国家采取差异化限制、提高定价甚至暂停服务。差异化服务与价格机制甚至服务中断，直接冲击数字经济运行与公共服务稳定性。

第二，规则排他与标准外溢压缩本土空间。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机制与技术联盟，将自身标准与治理理念外推，在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与伦理审查等领域设置高门槛，部分发达国家甚至将意识形态或气候变化等议题与技术合作捆绑，忽视南方发展阶段与基础条件，导致部分国家被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之外。同时，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推动自身技术标准成为全球默认规范，导致南方国家不得不被动适配外部规则，本土治理理念与制度实践空间持续收缩，本土模型发展受限，结构性依附进一步固化。

第三，智能鸿沟与能力短板削弱治理效能。在区域内部，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中心城市，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例如，肯尼亚的应用高度集中于内罗毕等大城市，而巴西的环境监测系统难以覆盖偏远的雨林地带。从国家间差异看，印度与巴西等国面临算力不足问题，最不发达国家仍处于初级阶段，导致多边层面难以迅速形成统一的协调框架。同时，多数南方国家法律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在数据安全、算法公平与隐私保护等方面存在制度空白，执行细则与问责机制不足。更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兼具技术认知、法律素养与治理经验的复合型监管人才极度稀缺，使监管部门难以有效应对算法黑箱与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形成制度存在与执行能力之间的显著落差。

（四）推动治理建章立制的三条路径

路径之一是确立发展导向的风险治理框架，推进本土化与协同化的制度体系建设。以安全底线为前提，将普惠发展、就业影响、公共服务可及性与语言文化多样性纳入核心目标，形成分级分类、比例适当的监管模式，避免高门槛合规抑制创新与数字化转型。依托“一带一路”与金砖合作机制，弥合基础设施、产业

与规则层面的结构性差距，推动治理逻辑由“风险优先”转向“安全—发展”协同。同时，根据应用场景与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将人工智能划分为普通、重点与高风险类别，构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理目标体系。将发展权确立为优先导向，使制度设计服务于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一方面，通过规则引导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农业与减贫等领域的应用，扩大技术红利覆盖；另一方面，关注就业结构变化，完善技能培训与转型支持机制，缓释技术冲击；同时强化文化适配要求，防止技术输出对本土文化空间的挤压。需要立足发展阶段与治理能力，避免照搬外部模式，分阶段完善数据治理与算法问责规则，增强制度可操作性；同时强化制度间衔接，推动人工智能治理与既有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及知识产权框架协同，逐步构建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本土治理体系。

路径之二是以能力建设为支点，构建可落地的人工智能治理公共产品体系。需要围绕关键环节，推动制度模块化与技术工具化，将原则性共识转化为可执行的流程、清单与指标。内部能力不足是制约全球南方推进人工智能治理建章立制的核心瓶颈，因此需以协同路径夯实制度落地基础：一方面，以体系化能力培育补齐发展短板，通过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重点培养兼具技术能力与治理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并依托南南合作与多边培训强化跨境能力共享；同步加快构建可复制的制度模块与技术工具体系，如轻量化算法审计工具、数据安全监测系统与 AI 影响评估模板，降低治理门槛，结合开源模型与平台应用，减少对闭源技术的路径依赖，并统筹推进数字与算力网络建设，提升偏远地区覆盖能力，为治理规则实施提供基础支撑。

另一方面，以公共产品供给强化制度执行能力，依托多边机制系统整合治理规则模板、风险评估清单、合规审计流程与技术标准指南，构建统一的人工智能治理“工具箱”，并在数据跨境流动与算法伦理等重点领域探索规则模板与量化评估体系，同时推动公共产品本地化适配，提升规则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与此同时，以监管能力升级提升治理效能，通过构建跨国监管协作网络、开展专业培训与经验共享，强化监管机构履职能力，并推动

监管技术创新，开发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工具，如算法歧视识别系统与数据安全监管平台，实现数据流转全流程可追溯与风险可控，从而弥合“有规可循”与“有力执行”之间的现实落差。

路径之三是以“南南合作的规则协同”提升集体行动能力。通过构建跨区域对话平台与联合研究网络，推动基础标准与治理框架的互认互通；完善算力、数据与开源工具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夯实本地化能力基础；并在多边场域形成更具凝聚力的共同立场，持续提升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治理议程设置与规则塑造中的话语权。鉴于单个南方国家难以独自应对技术封锁与规则垄断，需以协同路径破解治理困境：一方面，依托多边与区域机制建立常态化对话平台与联合研究网络，围绕多语言应用、农业与灾害预警等重点领域形成共识性治理方案，并推动区域内标准与伦理准则互认，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围绕算力短缺、数据薄弱与模型能力不足等瓶颈，构建资源共享机制，包括区域算力平台、数据共享联盟与开源工具体系，推进本地化语料库与评测基准建设，提升自主研发与风险治理能力；同时，在联合国、G20 及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政策协调与立场整合，推动将发展权与能力建设纳入核心议程，联合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技术标准与治理规范，以集体行动对冲技术垄断与规则外溢压力，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演进。

七、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合作和共同现代化的关键力量

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已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重要标志，其在推动治理改革、维护安全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进绿色转型及参与新兴领域规则塑造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与此同时，全球南方仍面临内部协调不足、发展资源约束以及外部地缘政治压力等多重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扎根南方、心系南方、服务南方”的战略定位，将自身发展同全球南方紧密联结。从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地到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深化南南合作到分享现代化发展经验，中国正日益成为凝聚南方共识、缓解发展赤字、推动共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一）坚持南南合作，筑牢团结互信的合作根基

南南合作是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核心路径。中国通过顶层理念设计与多边机制构建，不仅有效化解了合作阻滞，更以平等互利为准则，推动“全球南方”将庞大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实质性的“集体红利”。

第一，系统构建引领南方国家合作的理念体系，重塑国际发展议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关切，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GDI）、全球安全倡议（GSI）、全球文明倡议（GCI）、全球治理倡议（GGI）四大重要倡议，形成了支撑全球南方合作发展的理念体系，系统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普遍诉求，与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的呼声高度契合。特别是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将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南方国家最紧迫的发展议题列为优先领域，已有 100 多个国家及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超过 80 个，^①为全球南方确立了“发展优先”的国际议程。

^①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协力促发展 携手向未来 —— 在“全球发展倡议支持全球南方 — 中国在行动”主题发布活动上的致辞 [EB/OL]. (2024-09-27)[2026-01-14]. <http://www.cidca.gov.cn/20240927/df435e9f443e4ba0b80df4725d19b/c.html>.

第二，打造高能级务实合作平台，推动合作机制化和实体化。

中国牵头打造了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等一系列多边合作平台，为深化南方国家双边与区域合作提供了稳定、高效的对话与实施渠道。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例，该机制已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7月发布的《中非关系：深化拓宽合作之路》（Africa-China Linkages: Building Deeper and Broader Connections）^①报告指出，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贸易、投资实现跨越式发展，贸易额从2000年的106亿美元跃升至2024年的2956亿美元，增长近27倍，中国对非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0.8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39.6亿美元，且投资结构显著优化，从采矿业向制造业与技术转移转型。中国主导的合作平台已成为南方国家经济腾飞的助推器。

第三，强化公共产品供给和资源支持，填补全球南方关键领域资源缺口。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通过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中国为南方国家提供了灵活高效的资金支持，着力解决全球南方在公共卫生、应急援助等领域的短板。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不仅在新冠疫情期间履行向众多南方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与防疫物资支持，更注重“造血式”长效机制建设。中国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区援建了100多所医院和诊所，派遣医疗队员超2万人次，救治患者超1亿人次。^②2025年启动的“中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老挝血吸虫病消除项目，覆盖202个高风险村庄，直接惠及9.5万人，^③生动诠释了中国援助从“输血”向“综合治理”的升级。

（二）以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为全球

^①Abebe Aemro Selassie, Andrea Richter Hume, and Alfred Schipke. Africa-China Linkages: Building Deeper and Broader Connection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25. <https://doi.org/10.5089/9798400239182.071>.

^②新华社。特稿：南南合作的“中国样本”[EB/OL]. (2023-06-28)[2026-01-14].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8837.htm.

^③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中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助力老挝消除血吸虫病 [EB/OL]. (2025-09-19)[2026-01-14]. <http://www.cidca.gov.cn/20250919/7a51b84cae4d44c88c35166bbf11d65c/c.html>.

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全新路径选择和参照系。中国通过基础设施硬联通、产业技术软联通以及治国理政经验分享，助力南方国家充分激发自身潜能，走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推动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同现代化。

第一，突破路径依赖，提供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范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差异化道路。这一“范式溢出效应”极大提振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自信。在减贫、农业转型等领域，中国经验正被广泛借鉴。例如在非洲，中国援建了 24 个农业示范中心，累计培训技术人员超 10 万人次，^① 有效助力当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为解决了南方国家最基础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二，夯实基础设施硬件支撑，破解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瓶颈。基础设施滞后是制约南方国家发展的主要瓶颈。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互联互通建设，不仅改善了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带动了当地就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据《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非洲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铁路超 1 万公里、公路近 1 万公里、骨干通讯网络 15 万公里。^② 2024 年，中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 50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9%。^③ 亚吉铁路、蒙内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不仅打通了南方国家的经济动脉，更通过产业集聚效应，为其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奠定了关键硬件基础。

第三，注入创新发展动能，引领全球南方绿色转型与数字化红利共享。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通过技术转移、联合研发与人才培养，确保南方国家不被甩在绿色与数字时代不掉队。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在 14 个非洲国家设立 17 个“鲁班工坊”，

^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中国与国际发展报告：透视与展望 2023—2024 [M].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3.

^②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2024 版）[R]. 北京，2024.

^③ 新华社。2024 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超两成 [EB/OL]. (2025-09-08)[2026-01-14].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9/content_7039620.htm.

重点培养技术人才，不仅促进了当地人口红利的转化，也为工业化提供了智力支撑。^①在绿色发展领域，中国积极分享可再生能源技术，通过“中国—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等项目，帮助相关国家制定能源规划并建立技术示范点，中国已与 42 个发展中国家签署 53 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展近百个减缓和适应项目，累计提供或动员资金超 1770 亿元人民币。^② 这些举措不仅助力南方国家实现能源结构转型，更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三）坚守公平正义，引领全球南方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倡导并实践“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举措推动国际公平正义的实现。

第一，坚定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结构性改革。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倡导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恃强凌弱、巧取豪夺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仅 2024 年，中国对外缔结的国家间、政府间和政府部门间的双边条约、协定及其他具有条约、协定性质的文件就多达 200 项。^③同时，中国展现大国担当，联合国会费摊款比例从 2000 年的约 1% 提高至 2025 年的 20.004%。^④

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规则制定存在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不足的问题。对此，中国在多边机制中持续努力：在联合国框架内，积极推动安理会改革进程，倡议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将全球南方国家关切纳入全球治理核心议程；在金融治理及二十国集团（G20）领域，中

^①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2024 版）[R]。北京，2024。

^②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国行动 [R/OL]。(2024-11-15)[2026-01-14]。 <https://www.yidaiyilu.gov.cn/p/0CT6BJVF.html>。

^③ 外交部。2024 年中国对外缔结条约情况[EB/OL]。(2024-8-21)[2026-01-17]。

https://www.mfa.gov.cn/web/wjtb_673085/zfxxgk_674865/gknrlb/tywj/tyqk/202508/t20250821_11693684.shtml。

^④ 联合国大会。2025 年会员国应缴纳的会费[EB/OL]。(2025-1-2)[2026-01-17]。

https://static.un.org/zh/ga/contributions/index_2025.shtml。

国不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积极参与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支持非盟正式加入 G20，打破了全球经济治理长期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旧有逻辑垄断的局面，使国际规则更加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大金砖合作”等高能级南南合作平台高质量发展。自 2023 年金砖国家完成首次扩员，成员国从 5 国增至 11 国，人口约占全球的 45%，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占全球份额约 30%，已成为体量最大、代表性最强的“全球南方”多边合作平台。^①作为金砖国家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是大金砖合作机制的积极建设者。在行动指引方面，中国提出“和平、创新、绿色、公正、人文”的“五个金砖”建设倡议，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兼具包容性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在实践路径方面，中国以大金砖合作为支点，联动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等其他高能级南南合作平台，推动形成“平台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网络，打造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让南南合作从单一的双边援助，升级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协同发展新格局，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应对发展挑战、维护共同利益筑牢平台支撑。

中国通过引领金砖合作，不仅强化南方国家内部的协调联动，更推动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南方立场”。这一立场根植于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独立、谋求自主发展的共同愿景，既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债务问题等全球性议题上发出了协调一致的声音，也为重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注入了具有凝聚力的南方力量，彰显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格局演变关键推动力的重要价值。

第三，积极参与新兴领域规则塑造，维护南方国家发展权益。中国始终以多边主义为导向，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磋商与制定，同时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通过务实举措与制度供给，维护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平等话语权与发展权益，推动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DP, current price[EB/OL].[2026-01-17].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PPGDP@WEO/OEMDC/ADVEC/WEOORLD>.

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

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立足自身发展经验，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多份倡议，推动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数字契约》落地和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确保各国共享数字机遇，促进人工智能朝着向善普惠方向发展。在生物安全这一关乎人类共同福祉的新兴关键领域，中国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为核心法理基础，牵头制定《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积极推动规则体系完善，同时聚焦南方国家能力短板，通过规则引领与务实合作并重，守护发展中国家在生物科技领域的平等发展权与安全自主权。在气候环境领域，中国推动达成并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出资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领域的持续深化，中国将继续以南方国家利益为重要考量，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注入更多发展中国家视角，用务实合作与坚定担当，守护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益，共同书写全球新兴领域治理的共赢篇章。

课题组成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 赵 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红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助理、
青年研究员
王慧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智库发展与科研服务处科长、助理研究员

国际关系学院

- 谭秀英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主编、编审
刘中伟 国际关系学院科研管理处负责人、
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
沈 洁 国际关系学院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
莫盛凯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侯为刚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
钱坤强 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张国帅 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谢 磊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刘 欢 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助理研究员
周子淙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助理研究员

复旦大学

- 姚 旭 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秘书长、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江天骄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罗皓月 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项目主管